

陈宣良 — 著 —

卷三

中国文明

本质

的

以“连续性文明”为视点观照从英雄时代（酋邦时代）开始到战国时代结束的先秦封建社会。摒弃西方社会发展的经典理论，从自身历史出发，深入思考中国作为全责社会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从封建走向帝国的演变和特点。

陈宣良—著—

卷三

中国封建文明——连续性文明概念下的思考

全责组织结构下的公共权力一体化
——一种历史哲学的思考

中 国 文 明

的

本 质

世纪文库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明的本质·第3卷/陈宣良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415-7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文化史—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0543 号

出品人 邵 敏
责任编辑 邵 敏 任 柳

封面装帧 | Topman Design 五行人平面艺术设计 |
TEL:021-64750887



中国文明的本质·卷三
陈宣良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31
插 页 2
字 数 489 000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3415-7/G · 1763
定 价 48.00 元

目录

第一章 中国的英雄时代	1
第一节 中国英雄时代发生的背景	2
中国氏族部落时代文化的分布	3
迁徙	10
资源争夺	13
第二节 中国英雄时代概貌	18
中国英雄时代出现时期的大迁徙	18
涿鹿之战	24
五帝时代	35
第三节 “父系氏族”和“部落联盟”——英雄时代的基本社会组织	42
一、英雄时代的社会结构	44
关于“父系氏族”的概念的问题	44
关于中国英雄时代的血缘关系方面的革命	48
部落联盟时代的社会结构	52
二、关于英雄时代的一些误区	56
关于财产关系的变化	57
关于婚姻和性禁忌	62

第四节 黄帝故事的一种解读	69
黄帝的故事意味着什么：对王族联姻本质的反省	70
少典部族与有蟜氏部族通婚事件发生的背景	77
少典部落的处境	81
不同文化的部落之间联姻的本质：父系血缘关系的出现	85
父系氏族和部落联盟	89
第五节 英雄时代的动员模式	94
黄帝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	94
新的动员规模的出现	100
英雄时代的公共权力（一）：行使权力的方式及原则	104
英雄时代的公共权力（二）：权力的传承模式问题	110
英雄时代的公共权力（三）：权力本质的问题	114
小结：中国英雄时代概貌	118
第六节 绝地天通及其历史意义	121
关于话语权力	121
绝地天通：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宗教改革”	129
绝地天通的意义：对于话语权力的垄断	133
第七节 熟人文化，礼的本质	138
生人和熟人	138
熟人文化	146
武力出现对于话语权力的影响	153
将生人熟人化	160
礼：将熟人内部的法则推广到陌生人之中而产生的法则	166
第八节 英雄时代概述	171

第二章 中国封建文明	175
第一节 夏——中国文明的曙光	177
从文明的定义看夏代	177
夏文明产生时的历史场景	181
关于大禹治水	185
夏朝的建立	189
第二节 井田制与封建国家	194
关于井田制	195
生产方式改变的可能和需要	199
井田制的本质	205
城邑—乡遂制度	212
封建古国概貌	217
第三节 王族中实行的两种父系氏族制度	222
一、禅让：一种特殊的世袭	223
“禅让”的概念	223
立长和立贤	226
立贤：禅让的理论依据之一	230
二、父系血缘关系的发生	235
关于内婚和外婚的概念	235
商王的继承方法给我们的启示：内婚法则	238
周人的王位继承制度：外婚的父系氏族制度	245
小结	253
第四节 关于中国文明本质的一些思考	255
一、中国文明的全责组织社会本质	255
关于封建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理论问题	255
中国文明的基本结构	260
中国文明的运作原则：“无为”	266

二、中国特色的财富	271
中国文明中财富的形成	271
经济秩序为军事动员的需要而建立	275
中国文明中的财富的本质	280
三、中国文明中的阶级	287
政治性阶级	287
个体和封建	295
中国文明结构中最关键的阶级：士	301
四、总结	307
 第三章 从封建走向帝国	311
第一节 兼并与封建制度的解体	313
一、论为什么兼并，或者自足组织的个性	314
二、封建与兼并	319
封建王朝与诸侯之间的基本关系	319
封建的结构	324
三代兴亡	330
兼并的动力	337
三、关于郡县制	343
郡县制	343
郡县制存在的条件	346
郡县制的实施	350
第二节 氏族部落组织的瓦解	357
氏族部落组织瓦解的过程	357
从部落到村落	361
第三节 从封建到集权	369
一、国人与野人区别的弱化	370
民与农	370

税收	373
二、变法	375
关于法的概念问题	376
关于儒法斗争	379
法家的变法	383
儒家的变法	388
三、朝廷	392
家臣	394
卿士	399
第四节 卿士贵族到官僚贵族的演化——游士的问题	403
一、封建贵族和官僚贵族	404
封建贵族与官僚贵族不同的权力来源	405
封建贵族与官僚贵族运用公共权力的方式	410
二、关于游士	415
士的本质及其演变	417
游士	421
忠—信（一）	426
忠—信（二）	432
关于人道主义的一些联想	435
第五节 关于中国文明的社会结构问题的一些思考	444
封建与帝国动员制度的异同	444
全责组织条件下如何建立共同话语	449
小农社会的由来	453
封建与帝国政权组织的区别	457
中国文明的中间结构	462
中国文明的中间阶级	466

五帝时代——中国的英雄时代——以酋长氏族联盟的方式，将部落组成联盟或者说酋邦。

这也使得中国社会进入了父系氏族时代。

【第一章】 中国的英雄时代

前面的一卷，我们的讨论所围绕的主题是人的本质或者说人类文化的产生，因此，我们的“历史描述”事实上更多表现的是一些“制度性事实”，而从这一章开始，我们的讨论将是具体的中国文明的本质，因此，我们的讨论自然就会更切近具体地域内的特殊条件，更注意这个世界展现在我们前面的“面貌”，具体地说，就是中国历史的面貌。

我们的讨论是从中国的英雄时代开始。从时间意义上说，这个英雄时代与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游牧文化的出现大体同时，只是，这同一时期的历史发生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之内，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虽然与这个游牧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就是在这个文化出现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什么是英雄时代？或者说，与游团时代和氏族部落时代相比，英雄时代的本质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说过，最简单地说，英雄时代是物理暴力或者说武力行为——战争——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出现的时代。这种解决集团之间矛盾的新

方式，预示着人类文明时代的到来。

而如果我们要简要地说明中国英雄时代的特征，会是什么呢？应该说，血缘集团形式下的全责组织，在英雄时代不仅没有像游牧文化和西方世界中的一些文化（如苏美尔、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那样进入解体的过程，它反而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进一步被强化。

这种历史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过程在中国是如何具体发生的。

虽然讨论的直接目标是英雄时代，但是，英雄时代是在氏族部落时代背景之下发生，对于中国这个连续性文明来说，这种更为遥远的史前文化的历史，事实上也不能不有所涉及。我们对于中国远古历史面貌的描述，将从氏族部落时代的文化说起。但这里所讨论的氏族部落文化，不再仅仅瞩目于制度性事实，而是会更具体地涉及到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具体场景。

第一节 中国英雄时代发生的背景

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思考，似乎不应该对于历史现象做细致的描述，因为这是历史学而不是历史哲学的任务。但是，对于“史前”的历史来说，其中“猜测”或者说推断的成分原本就比较浓重，而所谓“猜测”或者说推断所依据的，其实主要是历史哲学所确立的模式，因为史料不仅稀少，而且往往非常抽象，解释的可能性太多。我在这里，不过是借助古代典籍尤其是现代考古的发现而将我在前面的理论讨论中确立起来的模式以一种更为形象的方式再一次叙述出来，或者说，以更现象、更直观的方式叙述出来而已。

在上个世纪初疑古思潮最盛的时候，有人相信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人是在西方发源的文化的影响下进入文化状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些从西边和北边迁徙过来的人带过来的。^[1]通过考古的发现，我们现在知道，中国

[1] 关于疑古思潮，吴少珉、赵金昭主编的《二十世纪疑古思潮》介绍得全面而清晰。详见吴少珉、赵金昭：《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学苑出版社，2003年。

文化是自源的，创造了中华文明的人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中国人在很长的时间里相信，现代中国文明单一地来源于中原的华夏文化。而以考古发现参照古代典籍，我们现在知道，中国文明是在现代中国这片土地上多源头的文化的接触和融合中发生的。

各种文化在这个地区的发展和文明在中国出现，与这里存在相当丰富的生态过渡带是密切相关的。

直接参与了进入文明过程的氏族部落原始文化，在中国主要是指发生在黄河、长江和辽河三条河流域的原始文化，现代在文化上显得非常活跃、经济也非常发达的中国南部地区，则在北方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许久，仍然处在氏族部落时代。那里是在北方文明的扩展中进入文明的。

这样的历史情况发生的根本原因，应该说仍然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在冰川过后的原始农业发生的时期，南方也与北方其他地区一样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氏族部落时代。但是，由于那里主要是山区和密林地带，而不是典型的丘陵和草原疏林地区，可供当时人类生存的优越生态过渡带地域大多比较狭窄，因此这里的部落时代文化的规模一般不是很大，虽然同样非常地古老。而且，当距今5 000年前北方地区气温降低的时候，中国南部地区所受到的影响要轻微得多。因此，当北方不得不回应自然的挑战的时候，南方人则仍然在伊甸园中生活着。事实上，如果我们向更南的方向看，这种文化存在于南、北太平洋交界地带的陆地上，甚至一直保留到上个世纪的早期，直到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才把那里的“野蛮人”带入文明。

我们对于中国原始文化的讨论，因此也主要集中在中国三河流域地区。

中国氏族部落时代文化的分布

中国的地势决定了中国河流基本上是沿着同样的纬度行走的，气候与河流走向的一致使得在描述中国文化时可以用河流来命名。

原始文化的分类，一般依据其产品的分类。气候对于农业的直接影响，使得不同气候下的农产品有非常大的不同。就中国北部的三河来说，黄河流域的文化，一般可以说是粟米文化，但是，河套北部的地区要除外，长江流域是稻

米文化，而辽河流域则是前畜牧文化。这样一些说法当然很粗略，不同的文化还有各自的不同特点。

中国的地形分为西高东低的三个台阶，第一台阶即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第二台阶，是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而第三台阶，则是青藏高原。

我们知道，生态过渡带是一些地处中间纬度且海拔落差比较明显的地带，这样，我们就发现，中国的生态过渡带，就处在黄河、长江和北方的辽河三河流域与各个台阶的过渡地带，即处在第一台阶中海拔变化巨大的山脉湖泊地带，具体说，就是沂蒙山脉和太湖、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的山脉地带，作为第一和第二台阶的是太行山脉和秦岭山脉，从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是祁连山脉、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等。

中国氏族部落时代的原始文化，就分布在这些生态过渡带上。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个生态过渡带上分布着大约8至10个各自独立发展的原始文化或者说氏族部落文化。它们是，处在辽河一带的通古斯—女真^[1]文化，处在黄河中上游河西走廊一带的羌文化，黄河河套北部地区的狄文化，中原地带的华夏文化，沂蒙山脉地带的东夷文化，处在长江上游的巴人文化，中游的苗蛮文化和下游的畲人文化，而整个的中国南部地区，则是越文化分布的地带。

应该说明的是，这些名称并不是经典的，也并不符合现代考古学命名的惯例，我使用这样一些名称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对这些古代文化的历史、地理分布产生直观的印象。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将这些文化描述一下。

最有名、也是最核心的，就是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它是中国考古学开始出现时第一个按考古学的惯例以最初发现地来命名的文化。^[2]仰韶文化，我在这里也称之为华夏文化或者中原文化，其遗址多出土在黄河中游及其主要

[1] 最古的古籍中一般称为“肃慎”，后来的金和最后的清，是对同一民族的不同汉字表述。

[2] 我想在后面的讨论中更一般地使用“中原文化”或者“华夏文化”这样一些概念，虽然并不“科学”，但对考古学不熟悉的人是更容易明白的概念。这种概念也往往更容易与我们比较熟悉的古代典籍产生一致的联想，从而对于我所讲述的历史有更直观的感受。

支流渭水流域的太行和秦岭山脉一带的河边台地上，它的分布，在今河南、山西、陕西一带。这种文化是粟米文化，它是在中国发现的各个古文化中地域最为广阔的文化，虽然在部落时代其文化的发展水平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原始文化相比并不一定是最“先进”的。

在中原文化的西边，处在第二和第三级台阶一带的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它是典籍中所说的羌人（羌戎）的文化。从文化的承传上来说，它与仰韶文化有些相同的特点，考古学一般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很早就与中原文化有所接触，甚至可能是同源的。但是，在我看来，原始文化之间的直接接触一般都很少。这种相同是由于同源文化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两种文化中的语言差别相当大，虽然都是属于汉藏语系，但是一个属于汉支，一个属于藏支，因此，如果说同源，则整个汉藏语系的民族都可以说同源。总之，即使中原文化与羌文化是同源的，它们分离也已经非常长久了。考古发展器皿的相似，很可能是因为地理条件上的相同造成的。至于图案方面的相似，由于线条简单，判断相似与否的随意性就太大了^[1]。羌文化的分布，我们现在比较注意的是它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分布，但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它显然与更西部和西南部的各个文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而在后来的发展中，与西藏和中国西南、以及西域的文化，都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他应该也属于粟米文化，但是，在其生产方式中，畜牧的成分比较大。

以上的两支文化，也许就是传说中的黄帝和炎帝文化，这样两支文化的接触发生得很早，周人的文化可以视为这两种文化结合的产物。这样一个历史使得长期以来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

另外一个与仰韶文化表现出联系性关系的是黄河河套地区的文化，称石虎山文化，大约在今宁夏西部，内蒙东部和山西陕西北部地区，它从地域上看与商代甲骨文中所称的鬼方或者后来的北狄很一致。这个文化总体应该说不属于自己粟米文化，而属于畜牧文化，其本身的分布，也要大大地超出现代中国的疆

[1] 仰韶文化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瑞典人安特生所发现和命名。这个名称成为中国中原地区古文化的命名。而也正是他指出了仰韶文化的陶片图案与其西文化中图案的类似，并设想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并开启了中国近代的疑古思潮。

界，而应该是后来的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匈奴—突厥—蒙古语族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个文化的核心部分应该是在我们讨论游牧文化时所说的北方生态过渡带上，即在阿尔泰山脉一带。在中国河套地区发现的北狄文化，应该只是这个文化中最南部的支系。这种文化的分布范围非常广，包括以叶尼塞河为中心的西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山脉以东的大漠草原，它后来是非常典型地以“否定”的方式参与中国文明发生和发展的一种文化。但是，在游牧文化还没有正式发生的时期，他们向着中原地区的迁徙与后来的游牧文化对农业文化的入侵本质还不相同，应该说，他们也积极地参与了中国进入文明的过程。现在作为中国人典型图腾的龙，也许是从这个文化中发源的。

在今东北，则是辽河流域和燕山山脉北麓与草原相接的更有名的红山文化，它当是后来对中国历史影响非常深远的阿尔泰通古斯语族的各民族的滥觞。也许我们说曾经两次征服过中国的金人或者清人，大家会更熟悉一些。历史上的女真、肃慎等等，所指的都是他们。我们现在往往也把属于这种文化传承者的东北各民族称为“游牧民族”，这其实是不确切的。从生活方式上说，这些民族应该属于半农牧、半渔猎的民族，这种生产方式应该说是非常原生态的原始文化的生产方式。就文化或者生产方式的方面说，他们与中国南方的文化处在大体相当的水平上。兴安岭以南地区的生态非常脆弱，一般说来，它是适合农业的，但一旦开发，生态很容易破坏，然而，在开发停止后，又可很快恢复。因此，这里没有变成仅仅适宜游牧业的干旱草原，但也不容易形成文化的积累和扩展。红山文化后来的发展中不仅可以发现仰韶文化的一些特点，还可以发现它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相关联的因素。考古发现，红山文化的文化层比较薄，而且有断续。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这里的文化与其他地方的文化相比，经历过更多的迁徙。他们也许去过南方，与中原地带、齐鲁地带的文化有所接触，而也会回到北方。他们可以说也曾积极地参与了中国进入文明的过程，但是，就它的本土来说，则是在中原文明的扩展过程中进入文明的，只是，在进入的时间上，他们比中国南方要更早。

大汶口文化是与仰韶文化同处黄河流域、同为粟米文化，而在文化风格上是非常独立的另一种文化。它就是古籍中的“东夷”文化，现在这是没有人怀疑的。由于地处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地区，说起齐鲁文化，人们总有比较具体

的感受，但齐鲁毕竟是后起的文化。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在现代地理中虽然显得很接近，但在氏族部落时代，华北平原尚没有形成，那里是人类不容易生存和穿越的沼泽甚至还是海洋，东夷文化的发生其实是在沂蒙山脉地区，它的发生与发展是独立于中原文化或者华夏文化的。

关于大汶口文化，也许我们说起蚩尤、共工这样的名字时会更熟悉。它应该也是大舜所代表的文化和后来的殷商文明的主干之一。

我们从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就可以发现，在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华夏、东夷和南方的苗蛮的争斗和融合。这里所说的“苗蛮”，在开始的阶段，主要是指长江中游平原上的大溪地或者屈家岭文化。从历史的时序方面来考察，这里首先出现的是苗蛮文化，在这种文化大体消失之后约一、二千年，这里又出现了楚文化，它是人们更熟悉的。但楚文化是否是原先的苗蛮人所创造的，我们则不得而知。但从所知道的材料来看，有承袭性的几率很小，而由外来人后来创造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无论是苗蛮文化还是楚文化，都是稻米文化。

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如良渚文化等，包括中国南部的原始文化，都是稻米文化。长江下游文化发展的水平，与华夏、东夷及苗蛮文化其实不相上下，但是，在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从中国古代的典籍上看，却几乎没有发现它的踪影。但是，我猜测周代的“徐”人，更早是所谓“九黎”，也许是这个文化中的一部分，虽然一般认为徐人是东夷文化的分支，但是，从文化的分布上看，徐人的主体部分其实要更南，从皖南一直到浙赣一带。史籍和地名中的“舒”、“畲”、“余”、“六”等等，其实都是徐的同一个名称的音变。如果就现在的江南地区进入历史典籍的视野来看，已经是春秋时代，即我们很熟悉的吴越文化。但是，如果从越人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与这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传承关系。这很类似苗蛮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越人的分布，从长江的下游一直到整个中国的东南部，还要包括越南等地区，一般可以认为，越人是在中国北方已经进入文明之后、北方文明向东南扩展的过程中进入中国文明的。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接触较早发生，在山东一带发现过良渚文化的遗迹。从现在的文化分布来看，从黄河下游到环渤海地区，一直到朝鲜和日本，都属于或者部分地属于“稻米文化”，因此，从历史的沿革来看，它们也许可以被视为良渚文化的发展或者迁徙的轨迹。同时，虽然在典籍

中没有发现与这个文化相关的神话人物或者文化名称，但从考古的发现中我们知道，这里的玉石文化最为发达，而玉石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崇高地位与这个文化的渊源关系非常明显。

还有一个就是长江中上游的文化，它处在四川盆地的平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带，也属于稻米文化。宝墩文化的名字也许没有什么人知道，但三星堆的名字，现在是变得越来越有名了。巴蜀的名字进入中国古人的典籍也相当晚。但是，如果以方言作为依据来推断，楚文化的核心湖北一带的方言与巴蜀方言非常相似，而与苗瑶的语言则有相当的距离。推断起来，也许是巴人，而不是原来的土著苗蛮人创造了楚文化。虽然现代人说起楚文化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地区是在江汉平原一带，但其实，当时这里是泽国，楚文化的发源地在荆山山脉，从地域上说，与四川的关系的确很密切。

南方的文化，有名的有凤鼻头文化等，他们之先后进入文明，我们说过，是与北方文明的扩展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文化应该是越人文化的源头。虽然中原人把南方人和北方人都用蛮夷这样“非我族类”的名称来称呼，但长江流域以及发展得比较晚的越人都是属于汉藏语系民族。

按比较公认的看法，华夏文化是中国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主体。但是在我看来，地处中原四方、与中原文化有着直接接触的北狄文化、西戎文化、东夷文化以及苗蛮文化的贡献，与中原文化相比也并不逊色，这些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因素在中国文化中有非常清晰的展现，应该说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主干。而其他的文化，则是“边缘化”的，虽然从人的血缘关系上看，这些文化中的人也许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而且，他们构成现代中国人口中的大部分，这应该说也是事实，否则，以原来中原文化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的速度，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现在如此规模的人口。但就其在新石器时代形成的“文化”本身来说，其进入中国文明的方式与华夏文明等毕竟是不相同的。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人的“天下”的概念和“五岳”的关系，五岳被认为是撑起“天”的支柱，因此，五岳保护下的地区就是“天下”。而五岳所处的五方，就正好是形成了中国文明的五个当初独立发展的文化，中岳（嵩山）是中原文化的象征，东岳（泰山）是东夷文化的象征，西

岳（华山）是西羌文化的象征（关中地区是炎黄早期融合的主要地带），南岳（衡山）是苗蛮文化的象征，北岳（恒山）是阿尔泰人文化的象征。这五种本来独立发展的文化或者民族共同撑起了中国文明这片天。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就上述这些文化的主体特性来看，可以肯定它们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但也可以进一步地进行一些综合，如黄河及以北的文化一般被称为“粟米文化”，而长江文化则被称为“稻米文化”。这种分野清楚地把华夏与苗蛮的文化区别开来。而西部和北方，在中国进入文明的时代，正是为地球的干旱化所苦恼，因此进入了游牧文化的地区，这里的文化从渊源上虽然与华夏文明的关系比苗蛮更密切，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与南方人的历史进程及作用都变得大不相同了。

时至今日，中国人不但操着不同的方言，而且，各个地区之间风俗习惯方面的差别也非常大，我们上面所叙述的各个不同的文化，似乎到今天也仍然能相当清晰地发现各自源头所带来的遗迹。这实在使我们不得不惊叹。

文化传统一旦形成，要改变它是多么不容易，于此也就可见一斑了。过去语言学家一般想象中国众多的方言是中原语言在扩散过程中的音变造成的。但是，这种说法其实很粗糙。首先我们要问，音变是如何产生的？如果是因为隔绝久了，逐渐发生的，就很难让人信服。中国毕竟是统一的帝国，各个地区并不是完全隔绝的，而且，方言的区别如此之大，不是同一种语音在两千年的时间里能够演变成的。当然，我们也可以问，音变是否是中原语言进入地方之后，与当地的土语混合之后产生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问，这些地方原来的土语是如何产生的？我的回答，自然是说，这里原本就存在着独立发展着的原始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说方言是中原的语言扩散中发生音变的产物吗？

所谓方言，是指统一的语言中，发音中有不同的口音。因此，说方言存在，的确不能否认中原语言的推进，方言的确是中原语言进入非中原地区的产物，许多概念进入了这样一个地方的语言，对于这样一些地方的语言本身进行了改造，但是，土语原本的发音方式，则仍然保留了下来，这就是方言产生的真正原因。

这些应该说都是“后话”了。